

内 容 提 要

人民解放军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并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国家、军队相互关系的原理。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工人阶级状况的变化，没有改变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质；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国家上层建筑的某些变化，没有改变其反动本质。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建立并领导军队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争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环境、任务的变化，没有改变党和军队的关系。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党只有牢牢地掌握军队，才能巩固执政地位，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军队纳入国家领导体制，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一致的；我军具体任务的转换，不是根本属性的改变。有人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是妄图使我军摆脱党的领导，改变我军的性质。

世界局势趋向缓和，没有改变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乱国必乱军。我军面临着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严峻考验。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使我军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筑起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堤坝，保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从而保持无产阶级性质，胜利地履行职能。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揭示了我军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必须紧紧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目标，遵循自身的特殊规律，不照搬地方的经验和外军的做法。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只能坚持不能动摇，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管如何更新换代，党和军队须臾不能分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丝毫不容动摇。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不容动摇

人民解放军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并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历史证明，它是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可靠保证。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有的同志对这一重大原则问题，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产生了一些疑虑和混乱。立足新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澄清是非，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国家、军队相互关系的原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没有过时

无产阶级政党要率领人民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就必须掌握一支强大的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国家、军队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是革命导师一百多年前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否还具有真理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还有无坚实的理论依据？对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并取得共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发生了变化，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质没有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仍然必须建立和领导军队，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它原因，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工人阶级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知识、技术素质有了提高；“白领工人”增加，“蓝领工人”减少；劳动条件和物质生活有所改善；部分工人有了少量股票和“参与决定权”，等等。然而，这些工人不论是“白领”或“蓝领”，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是受雇于资本家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仍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资本主义国家采用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工人实际工资时有下降，尤其当生产发展缓慢和停滞的时候，首先受到损害的是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材料，美国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在全国占有的份额从1970年的40.9%提高到1985年的43.5%，最贫困的1/5家庭的收入则从5.4%下降为4.6%。至于部分工人掌握少量股票和参加企业管理，那只是资本家进一步控制工人的手段，使其更听命于资本家的剥削。事实说明，工人阶级状况的上述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没有终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相反，这种对立和斗争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而不断加深和发展。敌对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斗争发展到极端便进入战争。因此，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①的科学论断在当代并未过时，军队作为无产阶级同

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没有一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军队，工人阶级的翻身解放是不可想象的。

马克思主义又告诉我们，军队是遂行政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历史使命，必须运用军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领导军队进行社会革命，仍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途径。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问世以来，为了缓和其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曾多次对生产关系作过局部调整。当代这种调整又有新的花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了更大发展，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节，推行所谓企业“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运用财政手段调整不同产业和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改善资本家与工人间的关系等。从表面看，这些似乎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无产阶级不需要进行斗争了，其实却不然。这种调整只不过是资本形式的变化，而资本的本质并没有变，资本关系也没有变，丝毫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能自行消除和解决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①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率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战胜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也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好，都得依靠一支人民的军队。离开了人民军队和武装斗争，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了进一步局部调整的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②仍是至理名言，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历史使命，就必须建立和领导自己的军队。

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某些变化，没有改变其反动本质，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领导军队，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伴随着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如有的西方国家允许共产党存在和活动，放宽选举条件，扩大选举范围，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等等。这些变化，从形式上看好象具有“人民性”，代表了不同社会成员的意志，其实，都是以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条件、并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具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当资产阶级手中掌握着完备的国家机器和庞大的军队的时候，某些改良措施的实行，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修修补补，丝毫没有改变其反动本质，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体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意志。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就必须“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③当然，无产阶级并不是不愿意以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也不排除在特定的条件下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这只是“革命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④，迄今尚无成功的先例。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军队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二战后，有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本来掌握了数量可观的革命武装，可他们企图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把军队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结果枪交权丢，革命惨遭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坚决顶住了敌人的欺骗和威胁，斩钉截铁地宣布：一支枪一颗子弹都不交出去！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武装斗争这一

法宝，建立了新中国，并使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在当今资产阶级武装到牙齿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不依靠党建立和领导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就难以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

环境、任务的变化，没有改变党和军队的关系，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不能淡化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斗争，军队的任务同党的任务是一致的，这时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容易理解。但是，在党执政后，特别是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的中心任务由武装斗争让位于经济建设，军队的任务也由夺取政权转变为保卫和巩固政权；随着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党所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时成为国家的军队，纳入了国家领导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军队的关系有没有本质的变化？继续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不是合适？对于这样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必须正确地加以回答。

首先，应当看到，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象过去那样牢牢地掌握军队，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上，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面对的是一个相当成熟、还在继续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得不继续同武装到牙齿的强盗毗邻共处”，不得不在“被极端仇恨的阶级和政府包围”中生存。在这种环境中，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斗争的结局“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①。因此，我们必须格外小心，必须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然事件。人们不会忘记，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遇到了白匪叛乱和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三年，反动派就阴谋发动政变；越南和老挝独立后，不得不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反扑而长期进行抵抗战争；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胜利，美帝国主义就在朝鲜挑起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试想，如果党只是领导军队夺取政权，而执政后却放弃对军队的领导，“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其结果必然丧失自己的执政地位，葬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我国国内，虽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上仍然有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有各种扰乱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有贪污盗窃、走私贩私等破坏经济活动的新剥削分子以及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些人尽管目的不同，情况各异，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纠集在一起，使阶级斗争激化。国内这种小气候同国际的大气候交互作用，就可能出现风波。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1989年我国发生的政治风波就是一个例证。由于我们党牢牢地掌握了军队，紧紧地依靠军队，因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下一举平息了这场风波，捍卫了党的领导，捍卫了社会主义事业。斗争实践证明，夺取政权离不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巩固政权同样离不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论在有硝烟的战场，还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

其次，党执政后，军队纳入国家领导体制，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并不矛盾，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是一致的。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总结建国30多年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军情和实际需要，规定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

导全国武装力量。从而恰当地规定了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国家军委的设立，并不意味着党领导军队的终止。因为：（一）宪法是在确立党在国家生活中领导地位的前提下，设立国家军委的。宪法《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从法律上肯定了我们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的。这样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党的领导地位。既然党领导着整个国家，自然也就包括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在内。可见，宪法正是从国家的根本制度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也正是在这个根本前提下设立国家军委的，因而它没有改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地位和原则，只是通过国家军委贯彻党中央对军事工作和国防部门的决策与指示，使党对军队的领导与指挥，具有法律意义，体现国家意志，反映了我国政权和军队阶级属性的统一。（二）国家军委设立后，长期实行的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制度没有变。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党支部建在连上等，这些既是党领导军队的主要内容，又是在军队实施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这些根本制度，今天仍然在坚持和实行，并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加以完善。比如近两年来中央军委特别强调，决不允许其它党派在军队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未经相应政治机关批准，军队成员不得参加民主党派和宗教组织，不得擅自参加地方的群众团体，不得成立条令条例规定之外的团体和组织，等等。总之，军队中党的组织体制和机构是由中共中央和党的中央军委规定的，军队中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是根据党的指示进行工作的，这就保证了我军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程序，始终在党领导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三）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经过我党与民主党派协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同时成为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两个中央军委在人员构成和领导职能上是基本一致的，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便于对军队实施统一领导和指挥，既坚持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又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全国人民赞同和必须遵守的权威性。这种从国家的组织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可有极少数人在军队隶属问题上大作文章，鼓吹什么“军队国家化”，把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对立起来，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军既是党的军队，又是国家的军队和人民的军队。我军忠于党，与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因为党是我国政权的领导力量，是我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核心。党领导人民军队既是顺理成章的，也是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拥护。

再次，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根本属性，不会因党执政而改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军队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作为阶级斗争产物的军队，从来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非政治化”的军队。一些西方国家，标榜他们的军队是“中立的”，这只不过是句骗人的口号。实际上，他们的“中立”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不触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旦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军队中立的伪装就会撕得干干净净。1963年马里兰州剑桥大学和196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示威，1968年春的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美国政府都曾毫不犹豫地派军队镇压；英国二战后

35次出动军队干预工人罢工；1973年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某些改革措施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军队不但推翻了他的统治，还消灭了他的肉体。政治立场何等鲜明！正如斯大林一针见血指出的：“各国资产者都在撒谎，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恰恰相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军队过去和现在都被卷入政治斗争，充当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①。资产阶级之所以不愿意或不敢承认他们的军队介入了政治，正是为了掩盖他们军队卷入的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反动政治的真面目。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不存在自己的任何私利，在执政中不存在狭隘的利益倾向。因而我们不需要给军队披上“中立”的外衣，不屑于隐瞒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党建立和领导我们这支军队，就是为了保证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在这个崇高的政治任务最终完成之前，党一天也不能放弃对自己军队的领导。战争年代，我军是党夺取政权的工具，建国以后，我军是保卫党的执政地位和党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具。具体任务的转换，不是我军根本属性的改变。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我军摆脱党的领导，改变我军的性质。要害是企图把军权抓过去，进而把政权抓到手。这是徒劳的。

**世界局势趋向缓和，没有改变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
党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

进入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1989年下半年东欧局势发生剧变，二战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正向新的多极格局过渡，世界总的趋势是从对抗走向对话，从紧张走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对形势的这种估量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话”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限的消失，“缓和”不等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对立和斗争的终止。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军队面临的考验，毫不放松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西方资产阶级凭借经济、科技优势，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暂时困难，把和平演变作为他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手段。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客直言不讳地说，对“和平演变进行投资，比直接的军备竞赛得益要高一百倍”，声称要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求“不战而胜”。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海湾得手以后，更加趾高气扬，鼓吹要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私有制推广到全球。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今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集中体现，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在巩固国家政权、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中处于特殊地位，有着特殊的作用，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坚实依托和可靠保证，是一切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不可逾越的障碍。正因为这样，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把进攻的矛头对准我军，妄图把我军变成实现他们和平演变阴谋的工具。他们在总结北京暴乱失败的教训时说：“没有抓住军队”是个重要失策，当时“哪怕能抓住一个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扬言今后“要大做解放军的工作”。为此，他们加紧了对我军的渗透、策反、腐蚀和拉拢，千方百计对我军开展所谓“兵运”工作。他们不仅确定了近期目标和长远打算，而且制定了行动方案和时间表，还列出了重点渗透的地区和具体策反的对象，等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动向。我们将面

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严峻考验。

敌对势力对我军进行渗透和策反，尽管采用的形式多种多样，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同我们党争夺军队的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在于坚持还是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性质之攸关，生命之所系，胜利之保证。

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使我军在反和平演变斗争中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军队是执行一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头等重要的问题是听谁的话，跟谁走，执行谁的政治路线。我军的阶级属性决定，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党的指挥，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我军能够经受住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考验、在政治上永远合格的根本所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受了几十年冷战对峙的考验，但在敌人和平演变的攻势面前很快败下阵来。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条是执政的共产党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军队在关键时刻不听党的指挥，致使党和人民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我军只有自觉地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才能在国际形势急剧动荡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极其复杂的环境里，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经得起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使广大官兵筑起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堤坝。乱国必乱军，乱军先乱心，这几乎成了一切敌人瓦解社会主义的惯用手法。敌对势力同我们作斗争，重要手段也是与我们打“思想战争”。西方政要们曾经毫不隐晦地说：“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要以70%的力气用于攻心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西方的思想理论、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妄图从思想上腐蚀和瓦解我军。我们如果丧失警惕，就会铸成历史性的错误。有的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紧要关头，军队所以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倒戈，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长期以来放松甚至放弃了对军队的思想领导，任凭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思想防线一旦崩溃，军队就会不攻自破。党如果放弃思想领导，必然丧失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从思想上切实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官兵，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各个阵地，从而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和认识能力，为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我军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军队的领导权，历来是敌我争夺的焦点。敌人的诋毁也罢，心战策反也罢，归根到底是为了在我军内部培植、收买反对派和寻找代理人，摧垮军队党的组织。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才能把政治条件放在首位，保证按照党的德才兼备标准培养选拔干部，防止敌人打进来、拉出去，防止个人野心家和政治异己分子篡夺军队的领导权；才能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保持各级组织的纯洁和坚强有力，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步调一致地去夺取胜利。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放弃党的领导，象东欧有的国家的军队那样，连一个摩步营是否执行演习开进命令，都要由全营官兵投票表决，那就很难做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关键时刻就很难用得上、过得硬。

总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之本，发展之本，胜利之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肩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捍卫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和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在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愈演愈烈的今天，在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始终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胜利地履行我军的职能。

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不能改变我军的特性， 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和制度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

军队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这是新的形势提出的要求，也是新时期我军生活的主旋律。我军的建设和改革，不论是总体设计，还是具体实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指导方针。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揭示了党和军队内在的必然联系，反映了我军的本质，制约着我军的兴衰与存亡，是我军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这一规律，如同其它万事万物的规律一样，只能遵循，不能违背和改变。否则，就要受到惩罚。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另立党中央，分裂红军。抗日战争初期，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这些都使我军蒙受了重大损失。半个多世纪以来，正是由于我党我军矢志不渝地遵循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客观规律，坚持同各种违反这一规律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才使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我军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裁军百万，调整编制体制，改革干部制度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现代化建设有显著的进步，也是因为遵循了这一客观规律。因此，在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毫不含糊地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坚决防止可能出现的损害党的领导的做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是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总目标。革命化又是我军最显著的特色。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根本特色。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不管多么高，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始终不能变。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⑨。因此，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国情、军情，体现我军的特色。例如，军队深化编制体制改革，在沿着有利合成、精简机构、减少层次、精干灵活、提高效率的基本思路发展过程中，决不能改掉或削弱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制度；相反，要随着形势和任务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强固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企事业单位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其中有的可供军队学习或借鉴。但是，军队的改革，要着眼军队的特点，考虑自己的特殊性，不能生吞活剥地方的做法。例如，地方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我军就不能简单地模仿。因为军队与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地方企业是经济实体，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有必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而我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离开了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就不能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和稳定，不利于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其次，地方企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如果把大量工作都集中到党委来，势必产生以党代政的现象，不仅分散党委抓大政方针、抓思想和组织建设的精力，而且会影响中心任务和其它任务的完成；军队在和平时期，虽然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

局，但战斗队的根本任务没有变，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更需要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再次，地方企业党、政和生产经营工作，职能区分明确；而军队的军政工作密不可分，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既有利于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又有利于发挥行政领导的积极性。实践证明，我军长期以来坚持实行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体现了我军自身的特殊规律，符合我军的实际，是具有我军特色的科学的领导和指挥体制，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要吸收外军的先进技术，借鉴外军的某些作法。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要从我军的实际出发，切忌生搬硬套。比如，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外军现在几乎都是“一长制”，即各级军事指挥员为各该级的唯一首长，而我军实行的是“双首长制”，即大军区、军兵种以下各级军政主官同为各该级首长。这种做法也是由我们的国情、军情决定的。我军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相比，在阶级基础、性质等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我军本质的集中体现，而实行“双首长制”，正是为了实施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相比，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最初是由旧军队改造过来的，而我军是直接由党缔造和培育的；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历史上虽实行过“双首长制”，但几经反复和曲折，最终还是废除了这个制度。我军则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坚持这一制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实行这个制度，军事指挥归军事首长负责，政治委员集中精力抓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这就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它又可以使军政首长集中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和钻研本职业务，提高自身素质，成为本行的专家里手。它还有利于军政首长既分工又合作，相互弥补，相互帮助，相互监督。总之，我们实行的“双首长制”是立足于我军特点、适合我军情况的一项重要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 ※ ※ ※ ※

我们党的性质和我军阶级属性的统一，构成了党绝对领导军队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任何其它政党或政治势力所不能取代也不容取代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管客观情况怎样变化，也不管如何更新换代，党和军队须臾不能分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丝毫不容动摇。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注：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 ②《列宁全集》第23卷第93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 ④《列宁全集》第9卷第113页、第23卷第93页
- ⑤《列宁选集》第3卷第292页
- 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
- ⑦《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页
- ⑧杨尚昆：《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